

文心雕龍
今譯

周振甫 著



文心雕龙今译

附词语简释

周振甫著

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冀 勤

文心雕龙今译

附词语简释

周 振 甫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新兴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17·38 印张·409 千字
198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印数 31501-34500 册 定价：20.00 元

ISBN 7-101-00648-5/I·100

例 言

一、本书今译《文心雕龙》，是就《文心雕龙选译》三十五篇补译十五篇而成，即就“文之枢纽”中补译《正纬》，“论文”补译《颂赞》以下七篇，“序笔”补译《诏策》以下七篇。刘勰创作《文心雕龙》，是从“论文序笔”入手，即研究前人的著作和创作，按照文体分类，确定各体的选文，探讨各体文的特点，把这些特点归纳起来构成创作论，他的创作论是从研究文体论来的。他的文体论跟创作论密切相关，应该补译。

二、刘勰在《序志》里把原书分为五部分：一，“文之枢纽”，是文学理论的根本部分，即全书总论；二，“论文序笔”，是按照不同体裁来讨论有韵文和无韵文，即文体论；三，“剖情析采”，即探讨内容和形式的创作论；四，《时序》《才略》《知音》《程器》为一组，即从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和作家品德论的角度来探讨文学评论；五，《序志》是全书的序言。本书就按照这五部分排列，注明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文学评论、序言，使全书的结构更其明显。又把《梁书·刘勰传》列于全书之首。

三、《文心雕龙》是有严密体系的，但《物色》的排列似不合适，《物色》似不应排在《时序》的后面。根据《神思》的赞里谈到创作论的次序，“物以貌求”似应排在“刻镂声律”前面。现在因为附了本书的《词语简释》，为了便于检查原文，仍照原来次序排列，不加更动。

四、本书就所分列的各部分，都作了简单说明。有的说明一部分中各篇的逻辑结构，有的说明一部分中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稍作评价。

五、《文心雕龙》原文，本书即用通行的清代黄叔琳辑注本，删去了它的文字校注。原文有误字、衍文、脱字和异文的，根据范文澜同志《文心雕龙注》的校勘，还参考其他各家的校勘加以增补改正。凡是加进去的增补改正的文字一律用小字来和原文区别；原文是多余的、错误的，或有更好的字可换的，一律加上方括号。换言之，加方括号的原文表示是应该删去的，小字表示应该补上或代替删去的原文。如《附会》：“是以骀牡异力，而六轡如琴；〔并驾齐驱，而一轂统辐〕”；译作：“因此，驾车的四匹马气力虽然不一样，马缰绳却能拉得象琴弦那样和谐。”这就表示方括号里的话是后人加的，不是原文，要删去，所以没有译。据考证，嘉靖本、五家言本、《御览》五八五引都没有“并驾齐驱”两句。再说正因“骀牡异力”，所以有待于驾驶者的驾驭得“六轡如琴”，与“并驾”和“一轂”完全无关，跟上下文不相应。又如《声律》：“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夫〔商徵〕宫商响高，〔宫羽〕徵羽声下。”这里，原文脱去“关键”两字，补上时用小字来表示。又原文的“商徵”应改作“宫商”，原文“宫羽”应改为“徵羽”。这里在“商徵”“宫羽”上加方括号，表示这四字当删去，用小字“宫商”“徵羽”来代替。总之，加方括号的表示要删去的原文，小字表示补进去的文字。

六、本书在每篇前对内容作了浅释，有时也稍加阐发，或指出其中不妥处。

七、注释求简，主要参考范文澜同志《文心雕龙注》，兼采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凡引用《拾遗》处都注明杨注。

八、译文逐句直译，只是起到句解作用，用来简化注释。因此把段落分得短些，译文就附在每段下，便于对照。

九、译者限于水平，不论在直译或简注上，在各篇的浅释或各类的说明上，一定有不恰当甚至错误处，统希专家和读者加以指教，以便改正。

目 次

梁书刘勰传	(1)
总论	(5)
原道第一	(8)
徵圣第二	(16)
宗经第三	(24)
正纬第四	(33)
辨骚第五	(39)
文体论	(49)
明诗第六	(54)
乐府第七	(64)
诠赋第八	(73)
颂赞第九	(82)
祝盟第十	(90)
铭箴第十一	(99)
诔碑第十二	(107)
哀吊第十三	(115)
杂文第十四	(122)
谐谑第十五	(130)
史传第十六	(138)
诸子第十七	(153)
论说第十八	(163)
诏策第十九	(176)

檄移第二十	(186)
封禅第二十一	(194)
章表第二十二	(202)
奏启第二十三	(210)
议对第二十四	(218)
书记第二十五	(227)
创作论	(241)
神思第二十六	(244)
体性第二十七	(253)
风骨第二十八	(260)
通变第二十九	(267)
定势第三十	(275)
情采第三十一	(283)
熔裁第三十二	(291)
声律第三十三	(297)
章句第三十四	(305)
丽辞第三十五	(312)
比兴第三十六	(319)
夸饰第三十七	(326)
事类第三十八	(333)
练字第三十九	(342)
隐秀第四十	(350)
指瑕第四十一	(358)
养气第四十二	(366)
附会第四十三	(372)
总术第四十四	(378)
文学评论 (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作家品德论)	(387)

时序第四十五	(390)
物色第四十六	(407)
本略第四十七	(414)
知音第四十八	(428)
程器第四十九	(435)
序志第五十	(442)
文心雕龙词语简释	(451)
后记	(541)

梁书刘勰传

从传看，刘勰出身在没落的官僚家庭。由于他的父亲早死，家境贫困，他在定林寺里跟着僧祐生活了十多年，帮僧祐编定佛教经藏。这是他在南朝齐代的经历。序里说他过了三十岁，曾经梦见孔子，于是想到写《文心雕龙》，说明本书是在他三十多岁时写的。本书写定于齐代末年，约在齐和帝中兴元年（501）前后，上推三十多年，刘勰约生在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前后。刘勰把书送请沈约鉴定，当在齐末梁初，所以梁武帝在天监元年（502）用他做“奉朝请”，是没有实缺的官，当是沈约推重后的事。他在梁代做东宫通事舍人等官，曾上表请改用蔬果来祭天地。按《梁书·武帝纪》，天监十六年（517）十月开始用蔬果祭宗庙，那末刘勰上表当在十六年十月以后。后来梁武帝派他去整理经藏，完成后出家，出家后不满一年去世。他的去世当在梁武帝普通元、二年（520—521）前后。这是根据范文澜同志在《文心雕龙注》的《序志》篇里的说法。

对于刘勰的卒年，有一种新的说法，认为按照南宋和尚祖琇的《隆兴佛教编年通论》里，把刘勰的传附在萧统后面，认为刘勰在萧统死后出家，死在中大通四年（532），较范文澜同志的推算，刘勰该多活十一年。但南宋和尚祖琇并没有掌握新的资料，他引用的还是《南史》。在《南史》里没有刘勰在萧统死后出家的记载。祖琇也没有说刘勰在萧统死后出家。刘勰是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可能因此把他的传附在萧统传后。因此，这样的推算恐不可信。

刘勰的一生经历了宋、齐、梁三代，这三代文风，照刘勰说来，就是“讹滥”（《通变》《定势》《序志》），讹是追求诡异新巧，颠倒字

句，违反正体；滥是浮靡。讹滥的文风把创作引入歧途，他要从理论上加以挽救。他在《序志》里指出文章的作用：“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要用文章来著作国家的大典礼和法制，歌颂君臣的功德，记载国家的军政大事。这样讲，主要是说明文章要有内容，讲实用，目的在反对讹滥的文风。这是他所以笃信佛教而在《序志》里推重儒家的原因。他论文而推重儒家，目的在挽救文风的流弊，并不要求用儒家思想来写作，也不是要用儒家经书质朴的文辞来写作，他推重的是讲究辞藻、声律、对偶的骈文。那末他的《原道》《徵圣》《宗经》，只是对文章内容的要求，要求学习经书写出内容充实的文章来。

刘勰所处的宋齐梁时代，豪门世族过着淫靡的生活，当时淫文破典的浮靡文风正是世族淫靡生活的反映。宋齐两代的君主都出身素族，他们取得政权后，既要依靠豪门世族的支持，又要依靠儒家的礼制来进行统治。刘勰的反对讹滥，不是站在豪门世族一边，不同意他们过着淫靡的生活，这跟他家境贫寒有关。所以他的反对讹滥的文风，有它的积极面。还有，他精研佛家的经书，编定经藏，那要网罗一切佛家的经律论，区别部类。这使他的论文，也要网罗古今文章，分别部类，加以论述，使他写出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著作，超越了前人。当时，在文学的形式方面，正向情采、声律、丽辞上发展，但声律还没定型；在内容方面，趋向浮靡。刘勰在这两方面都看到了，看来他比钟嵘高明。钟嵘没有看到声律上的发展，他在《诗品》里说：“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对声律论采取否定态度。刘勰看到了这方面的发展，由于当时声律论还没有定型，所以他作了专篇论述，提出了合理建议，对声律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钟嵘的《诗品》写在梁武帝时代，当时的文学正向宫体诗堕落下去。刘勰的《文心雕龙》写在齐代，已经看到了这种堕落的趋势，他在书中反复提出纠正讹滥问题，可是在《诗品》里

却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当然钟嵘也有超过刘勰的地方，象他的强调五言诗：“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只是刘勰的地位低，而文学的堕落从统治阶级的上层开始，他不可能扭转这种风气。但他在文学形式和内容上都提出了新的见解，成为当时文学理论上的最高成就。后来文学的发展，一方面使格律诗趋向定型，一方面提出风骨来反对六朝的浮靡文风，正证实了刘勰的文学理论。

刘勰字彦和^①，东莞莒人^②。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③。父尚，越骑校尉^④。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⑤，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⑥，勰所定也。

①勰(xié 协)：和合的意思，所以字彦和；彦是美才。 ②莒：今山东莒县。东晋时莒县已非晋地，东晋明帝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侨置南东莞郡，刘勰的祖和父都住在京口。 ③司空：位在丞相下，主管治理水土等官。 ④越骑校尉：武官名，统率材力超越的骑兵，仅次于将军。 ⑤僧祐：齐代高僧，在定林寺主持搜集校订佛经，编定经藏。 ⑥经论：佛说叫经，解释经义的叫论，把经论等编成大丛书叫经藏。

天监初，起家奉朝请^⑦。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⑧。出为太末令^⑨，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⑩。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⑪，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⑫，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⑬，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

⑦天监初：当为天监元年或二年（502—503）。奉朝请：官名，是一种没有实缺的官，近于虚衔。⑧中军：中军将军。临川：郡名，治所在江西南城县。萧宏：梁武帝弟，官至太尉。兼：兼官，以奉朝请兼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在临川王府里做参军，掌管车骑仓库的事。参军，王府属官。仓曹，仓库部。⑨太末：今浙江衢县。⑩仁威：仁威将军。南康：郡名，治所在江西南康县。南康王萧绩：梁武帝第四子，官至安右将军。东宫通事舍人：在太子宫执掌呈进文书的官。太子是昭明太子萧统。萧统爱好文学，喜接待名士，编有《文选》，是一部著名的诗文选本。⑪七庙：天子的祖庙有七座。二郊：祭天地。农社：祭社稷，即谷神和土地神。⑫尚书：尚书省，朝廷政务机关之一。⑬步兵校尉：京中武官之一，当是兼官，他还在作东宫通事舍人。

初，颺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⑭既成，未为时流所称。颺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⑮。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⑯。约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然颺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颺制文。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⑰。证功毕⑱，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⑲。文集行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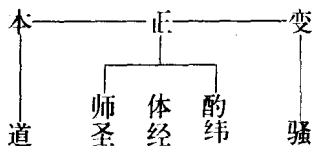
⑭这里引的即《序志》篇。⑮沈约：在齐官做骠骑司马。入梁，升吏部尚书兼右仆射。他是当时文坛领袖，主张诗文要讲究声律。⑯货鬻（yù 欲）：贩卖。⑰敕：皇命。沙门：和尚。刘颺前已编定经藏。这时，佛教的著作又有增加，梁武帝命令他重新修订。⑱证功：佛教以编定经藏为功德，所以称证功。⑲期（jī 基）：满一年。

总 论

《梁书·刘勰传》里称他编定定林寺的藏经，先是“博通经论”，对佛教的经和论都读通了，“积十馀年”，化了十多年的工夫。“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因此把佛教的经和论，分成多少部多少类，作了序录。这几句话，对我们理解刘勰的著作《文心雕龙》是可供参考的。他的编定藏经，要在博通经论以后，区别部类，再加序录。看他对《文心雕龙》，也作了序录，他的《序志》就是全书的序录；也是“区别部类”，分成几部、几类，这在《序志》作了说明，分“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招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即把全书分成枢纽、文体论、创作论、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作家品德论七部分。在枢纽里分成五篇，文体论里又根据不同文体分成多少类。跟他编佛教藏经的方法一样。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著作《文心雕龙》，为什么“体大虑周”远远超过前人，就是后来的文论著作，也很少能跟它比的。即使有的人在论文的意见上可以超过他，但就“体大虑周”这一点上比不上他。这同他具有编藏经的经验有关。他编藏经，化了十多年工夫的研究，博通经论。他著作《文心雕龙》也当是这样，化了很多年工夫，博通经史子集四部书以后。他编藏经，要区别部类，他著作《文心雕龙》也这样。看来他是先博通经史子集，再从文学和文章的角度，论文序笔，研究文体论；再从文体论中剖情析采，研究创作论；再研究文学史、作家论等，最后制定文之枢纽的。文之枢纽最重要，所以列前。现在先看他的文之枢纽。

“文之枢纽”，是刘勰文学理论的关键，接触到根本问题。这些

根本问题,就是《序志》里说的“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这个枢纽,建立了他的文论的体系,即:



根本是道,作品要本于道,按照对道的认识来创作。刘勰认为“道沿圣以垂文”,圣人能认识道,所以要师圣;“圣因文而明道”,圣人通过经文来说明道,所以要体察经文。纬书被一些人认为是配经的,所以要酌纬,把纬书跟经书分开,只能酌取纬书的辞藻,这样做是给文学指出一条正确的路。文学又跟着时代不同、生活不同而变的,这又要求新变,通过《离骚》和《诗经》的不同,说明文学的新变。在这个体系里,“道沿圣以垂文”,圣指儒家的圣人,文指儒家的经书,所以是以儒家为主来建立体系的。因为论文要靠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只有儒家有;论文要纠正当时浮靡和矫揉造作的文风,儒家的经书正可用来纠正这种文弊;论文要建立一个准则,儒家的经书有助于建立一个准则;所以依照儒家的经书配合《离骚》来建立文论的体系。

再就“本乎道”的道来说,以儒家之道为主,又兼采道家和其他各家。因为论文要靠文献资料,所以建立体系要靠儒家;但创作要纠正矫揉造作,崇尚自然,这就有取于道家;创作要“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这个学和理不能限于儒家,就要兼采各家。就《诸子》《论说》来看,兼包道家、佛教和其他诸子,这也是配合封建皇权兼采儒道佛诸子来的。他在《原道》里提出“自然之道”,这是从道家来的。他在《论说》里认为崇有、贵无都有片面性,只有“般若绝境”最全面,最高,这是从佛教来的。他在《诸子》里,对墨家的尚俭,尹文的讲名实,农家的讲地利,驺子的讲天文等,都认为“人

道”，这是他有取于诸子。因此，他的“本乎道”，在道的方面可以兼采道佛和诸子，是适应封建皇权的需要，也是适应创作的需要。

这样看来，刘勰讲文的枢纽，他的突出成就，超过以前文学理论家的，在建立一个文论体系，提出原道这一命题，提出“因文明道”，对当时文风具有救弊作用。提出“变乎骚”，注意文学的创新和变化。

在救弊方面，他提出明道宗经，反对偏重形式的浮靡的文风。提出自然，反对矫揉造作。提出“变乎骚”，指出文学发展要求新变，但要防止它的流弊，使它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

原道第一

《原道》一开头提到“文之为德”，这个文德，在《情采》里指出有三种：一叫形文，如颜色的玄黄，形体的方圆；二叫声文，象风吹树林，泉水激石；三叫情文，象抒情达意的文章。就形文声文说，他认为在没有人类以前，就有了“文”，“文”是跟天地一同产生的。

刘勰要这样讲，是要给他的文学理论找根据。从《原道》看来，他的理论主要有三点：一是作品要写得自然，反对矫揉造作；二是作品要讲究文采、对偶、声律；三是作品要效法圣人的经典。他这样讲，是要纠正当时作品的“讹滥”。讹滥的形成：一是由于矫揉造作，所以他要提倡自然来纠正它；二是由于偏重形式，忽略内容，造成浮靡的文风，所以他要主张因文明道，以情理为主、文采为次，主张宗经。

他在《原道》里给他的三点理论找根据。先说自然，他认为形文、声文、情文都是自然形成的。有了龙凤，自然有鳞羽的文彩；有了泉石，自然相激成韵；有了心意，自然有语言文字。所以既说“自然之道也”，又说“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又说“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也是说明文章是自然形成的。在这里，他举出天地、日月、山川、龙凤、虎豹、云霞、花木来说明自然界的一切都有文采，从而说明作品也要有文采。根据林籁、泉石的有音韵，从而说明作品也要讲音韵。从文采和音韵的自然形成，来反对作品的矫揉造作。

他由于反对形式主义地追求文采，所以要原道，指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提出因文明道的主张。这样，以道为内容的文，就不同于追求形式的文了。这是《原道》在当时所具有的积极性，即用有内容、尚自然的作品来反对追求形式、矫揉造作的

文学。

但《原道》里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他把自然之文和人文混淆了。他把自然界的天地万物所具有的颜色、形体、声音称为道之文；又把反映社会上政治教化的文章也称为道之文。认为这两种道之文都是自然形成的。其实自然现象所呈现的文彩是客观存在，作家的创作是主观意识，存在不同于意识，把两者等同起来是不对的。他把人文认为自然形成，说“人文之元”即最早的人文是从天地未分以前的太极来的，是神理的作用，象《河图》《洛书》就是神理所造成的。这种先验的神理，被圣人所认识，才有伏牺画卦，孔子作十翼（这是不可靠的）。这是说，最早的人文，是从先验的神理来的，这是客观唯心主义。

总之，刘勰论文提出原道，主要是为当时的封建皇权服务。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象宋齐两代君主，都出身素族，他们既利用儒家的伦常礼教来济俗为治，又要利用道家和佛教来麻醉人民。所以刘勰的所谓道，具体内容就是以儒家为主兼采道佛等，适应当时封建皇权的需要。当时的世家大族，过着腐化淫靡的生活，不愿受儒家礼教的束缚，浮靡的文风正是反映他们的生活。刘勰提出原道，要用“明道”即以儒家为主兼采百家的道来作文，来反对浮靡的文风，提出了文学革新的主张，所以是积极的。但由于他为封建皇权服务，提出神理设教，所以又有它的消极面。不过本书是讲文学理论的，主要宣扬了他的文学革新主张，这种主张针对当时讹滥文风是起到积极的作用的。

1.1 文之为德也大矣^①，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②；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③；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④；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⑤，